

东亚共同体构想去向何方：地区性身份的构筑

日本大学经济系 金田耕一

序言

2005年12月，首届东亚首脑会议（峰会）在马来西亚举行，在这之前被认为不过是幻想的「东亚共同体」开始真正向实现迈进了。东亚整体性的地区协作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的成立。之后70年代韩国，80年代ASEAN各国，90年代中国分别取得了巨大发展，东亚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基于「亚太地区」这一广义地区概念，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地区论坛应为始于1994年译者注）成立，97年东北亚的日本、中国和韩国与ASEAN，成立了ASEAN+3(APT)。在ASEAN创立后经过了近40年时间，东亚地区性统一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政策目标。然而，在这实现问题中，至今还存留着很多需要探讨的课题。

在本论文中，对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进行的讨论进行了整理，发现因为以经济领域协作为中心的统一有其界限，所以为了促进统一，地区性身份的构筑是不可缺少的。在此基础上，欲就地区性身份的构筑提出若干建议。

1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

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东亚提出了第一个共同体构想——“东亚经济集团”倡议(EAEG)。这一构想因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失败，但是，以之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东亚地区统一构想又再次浮出水面。东亚虽然没有其他地区那样的制度性框架，但却靠着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扩大而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为了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和韩国举行了首脑会议，就经济危机问题开始了磋商讨论。此年，即98年末，又根据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倡议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2001年的相同报告中，「东亚共同体」这一说法已经被广泛采用了。2002年，日本的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演说，倡议构筑「东亚共同体」。在2003年的APT首脑会议上，设立了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同意就「东亚共同体」构想进行共同探讨研究。2004年7月，作为APT外相会议的议长声明，宣布加强就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协作关系。

作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第一是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了，但使这种迅速恢复成为可能的，则是自由化政策带来的地区内贸易·投资的活跃发展。通过去除残存的贸易·投资壁垒，可以期待实现更加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

第二是各国就应对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地区协作制度化已成当务之急，这一点已形成的共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政府没有对陷入经济危机的各国进行援助，而是热心于批判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体制。另外，美国积极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政策，使得亚洲经济在短期内更加恶化。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唤醒了东亚各国的某种连带意识，或者说叫地区共同性，促进了地区单独危机处理机制的创立。

第三是以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东亚经济的扩张。在东亚各国对中国出口快速增加的同时，中国以高科技产品为中心的出口也大量增加。另外，以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为中心，消费不断增加，中国不再仅仅是生产据点，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与其

说经济协作以亚太地区作为框架，还不如说东亚地区在尝试构筑自我经济圈。

现在，东亚地区协作以APT为基础在向前发展。比如说，在2000年的APT上，同意建立在货币金融危机发生时地区内进行外汇融通这一框架（清迈协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2国间互惠信贷（通货互换）为基础的危机处理机制。另外，为了在地区内有效使用东亚丰富的资金，讨论了构筑亚洲债券市场这一问题。在贸易·投资领域，日本于2002年倡议进行包括一般不作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象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中小企业培养等内容的经济合作。在此基础上，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通过了经济合作协议（EPA），同时又开始了与韩国、印尼以及东盟整体国家的磋商谈判。¹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东亚经济的地区统一事实上已经在向前发展了。那么，为什么又需要重新构筑「东亚共同体」呢，其目的又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日本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2 向三种共同体发展

（1）所谓东亚「共同体」究竟为何物

在日本，现在对东亚共同体构想还存在着很强的怀疑意见或者反对意见。这种现象的背景在于，对这里所讨论的「共同体」的具体概念没有共同认识，因此对「共同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主观理解，出现了很多怀疑乃至反对的意见。

一般在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共同体」这一术语，表示的是这样一个集团：集团中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成员间相互承担义务和接受限制。当然，在国家关系中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一定属于严密的科学术语，经常会带有政治性的比喻或者说会被作为口号来使用。共同体这一词语也不例外。东亚「共同体」这一说法，应该是参考了欧洲「共同体」，以及之后的欧盟后提出的吧。

在EU中，成员之间拥有自由和民主主义、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法的支配地位等等共同的价值观，EU要求加盟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共同负有行动责任，所以EU是符合「共同体」这一说法的。另外，在EU中加盟国要让出一部分主权，消除相互之间的国境，从货币直到司法、外交、安全保障都要实现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EU是主权国家联盟，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超越国家性质的机构。

如果以EU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模型，那么现在所说的东亚「共同体」其实很难算得上真正的共同体。现在在东亚各国间，还不存在EU各国之间存在的那种共通价值、共通文化基础。虽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不断加深，但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生活、价值观、民族、宗教等方面则差异很大。没有经过统一在欧洲古罗马帝国或者基督教之下那样的经历。而以国家主权或者国民国家框架作为前提，就降低主权界限、让出一部分主权等地区统一方向的话题，则几乎没有被讨论过。

那么，东亚「共同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体呢？一般地，说到东亚共同体，人们在脑子里会想到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保障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三种类型的共同体。²因为不同的人会从这三种类型对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支持（反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意见其着重点也不一样。

暂且将关于这三种共同体的讨论分为market（市场）取向、polity（政治体）取向、community（共同体）取向的讨论。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本来就主要分为market、polity、community这三个侧面。market的原理是利益，市场共同体内进行财产和服务的交换。polity的原理是安全和秩序，其共同体内进行规则制定、调停对立与纠纷。Community的原理在于

身份认同和归属，其共同体内进行共同价值观的创造和维持。对基于这三种取向的讨论和现状整理如下。

A. market 取向的共同体

热心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大部分人，都是将这共同体作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来理解的。其原因很简单，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东亚共同体构想最早就来源于1997年突然袭击亚洲的金融危机这一经历，认识到了国际化带来的新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因此，东亚各国才开始就地区的共同课题进行研究，尝试建立新的协作体制。支持东亚共同体的大部分人，将这些机能性的协作关系以及制度等问题，用「共同体」这一词语予以表达，所以才有了以上的意思。

早在2003年，中日韩以及ASEAN各国、NIEs之间的地区内贸易就已经达到了53%。与此相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只有45%，欧盟也不过60%而已。如果考虑到东亚尚未建立制度性统一的话，应该说这一数字是惊人的。尤其是日本对美国贸易只占20%，而它对亚洲贸易却达到了40%，可以看出东亚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快速深化。

另一方面，政府间的合作也在加强。APT之后，地区协作在各个领域快速扩展，首脑会议、内阁官员会议、高级事务级别协议会议等等频繁举行。此种地区协作眼前的目的在于建立东亚范围的广域FTA，而在将来主题将是各国间就调整宏观经济进行政策上的对话、监督各国经济状况的监督机构、共同货币制度的建立等等金融协作方面的合作。如果这些得到实现的话，在东亚就可以形成稳定的地区经济圈，就更进一步地促进贸易与投资的灵活发展。

另外，伴随着贸易与投资的灵活发展，为了促进地区内劳动力、有用人才的有效利用，有必要进行外国劳动力接受体制的整顿，比如地区内入国管理的简化、以及「外国人雇用法」的制定等等。而且，由于东亚地区在能源上的对外依赖性很大，从原油共同储备、确保从中东输入原油路线的安全等协作、能源来源的多样化等目的考虑，提倡进行相关方面的技术协作。

不管怎么说，市场取向的共同体构想已经步入正轨，今后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进展。

B. polity 取向的共同体

即便在经济上东亚地区内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深化了，但在政治体制和安全保障问题上，各国间存在巨大的分歧，要达成共识非常困难。东亚的政治体制并不是都一样的。即便说欧式民主不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但亚洲各国间还是存在着议会民主制与军阀独裁、专制体制等政治上的差异。另外，EU各国在1950年代共同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各国之间存在着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安全保障政策建立的机制基础，而东亚各国间并没有形成过类似的地区安全保障体制，更多的是通过双边同盟的形式达到安全保障的目的。

然而，从战后开始达到现在这样相对稳定的亚洲体制，也花费了大约60年时间。虽然现在还存在着领土问题等等不安定因素，但对目前体制加以改变的尝试，却有可能造成地区不稳定。政体取向的看法认为，在维持先有政治体制和安全保障政策多样性的同时，即在不对现在地区秩序作大的改变的前提下，东亚各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建立共有的行动规范和纷争解决机制，是目前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于安全保障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讨论中不可能不考虑美国的存在。无论从历史、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来考虑，超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建立多国参加的安全保障共同体都是很困难的。在上面讲到的同盟基础上，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中心展开取得相互信赖和预防性的外交，这种地区安全保障对话今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一部分安全保障问题专家认为，东亚共同体构想不会被美国接受，但也有意见认为，如果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的目的是维持地区和平，那对美国来说这就是应该欢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一种不排除美国的形式来建立共同体，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给中美日三国间战略对话创造空间。

另外，也有意见寄希望于至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安全保障地区协作框架的建立。主要有通过围绕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和巴厘协定 II (Bali Concord II) 确立的安全保障共同体框架等等。

在对抗海盗策略等海洋安全保障，以及对抗恐怖主义策略等非传统性的安全保障上，具体合作也正在开展。而且，对 SARS 等传染病、对像印尼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毒品和武器走私、贩卖人口等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共同关注，各国间开展了很多跨地区合作。

其他方面，为了促进这类跨国地区合作，需要所谓的管理技能，即遵循一定规则对利害关系进行调整，在行为规范和纷争解决上遵守共同守则。这种地区性管理虽然会因为具体问题不同而在形式上有变化，但为了使其在现实中能真正发挥作用，政治性·法律性的基础是不可缺少的。专家指出，地区性规则及其具体运用、符合国际准则的国内规则等等都是必要的。

现在，在东亚地区虽然明显不存在政治方面的构想，但事实上各国行为规则正在渐渐一致。这是因为各国共有了公正贸易和公正市场这一共同规范。通过拥有这样相同的规范，可以慢慢将注意力集中到对相互对立政治问题的解决中来。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对传统安全保障等高端政治也可以进行共同合作。

C. community 取向的共同体

由于语言、民族、宗教的多样性，以及所有国家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社会，一个民族跨国居住在许多个国家等等原因，东亚地区文化多样性程度很高。因此有一种看法以此为依据，认为通过身份认同来建立统一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另一方面，又有意见认为不应着眼于东亚文化的多样性，而应着眼于其文化的共通之处。所谓的共通之处在于，东亚文化都属于「混合文化」。东亚各国曾经都是以中国这一帝国为中心的边境国家。从这个意义出发，东亚文化中中国文明的影响最强。但是，中国文明本身也是吸收了东南西北多种文化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

在东亚各国，以地方固有的土著文化作为基层文化，其上面又加上了儒学、道教、佛教等等由大陆传来的文化，再在其上加上近代由西欧传入的文化。这三种本来异质的文化，作为各国文化的构成要素混合存在。而其混合方式的不同就表现为各种文化各自的特点。确实，在各个国家虽然存在传统文化，但是并不存在单纯文化。因此，东亚文化具有对「外部」文化「开放的接受性」这一共同的特征³。

也有意见认为，东亚文化的多样性不应被当作障碍，而应该作为推动力来理解，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文化的统一，并进一步达到构筑共同身份的目的。这些学者特别关注了现在在东亚各国正在发展中的都市中间层文化的类似性。这一层中主要都是深受亚洲经济发展之惠的中产阶级市民，生活方式都为都市指向型。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中间层，通过其跨国跨地区的文化关注的扩展，正在发生同质化。这种中产阶级的新文化极有可能会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共同基础。当然，为了这一目的，自然应该大力促进跨越政治体系和经济差异的「东亚文化交流」。

另外，受 2000 年左右中国提出的「亚洲共同的家」这一说法启发，各国有识之士提出了「东北亚共同的家」、「东亚共同的家」等等很多构想。这种「我们」意识的形成和「想

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成立，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还处在探索过程⁴。

（2）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的界限

上文中对 market 取向、polity 取向、community 取向这三种东亚共同体走向作了简单考察，最重要的一点是，单靠其中任何一种取向都无法实现最终目的。

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经济性共同体，如果说它在真正意义上作为市场来发挥作用的话，那单单依靠在各种领域机能性的协作是远远不够的。比如，ASEAN 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关于协议的履行缺少了各国政府明确的政治性意向的话，将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加盟各国不是通过单单一时的经济协作来追求短期利益，而是要维持并发展市场以取得长期利益。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在中加入治理（governance）机能。也就是说，建立基于经济协作基本原理的、具有约束力的明确的行动规则，及促进这一规则被履行的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机制，以及共有纷争处理程序的管理机制的制度化等，这些都是必需的。

缺失了管理机能的市场即便再发展，既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相互信赖关系，也无法形成成熟的自立市场。为了使市场的管理机能能真正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各国拿出坚定的政治意向，就地区整体的治理客体进行协作，而要真正实现协作，就需要构筑政治共同体。

而要构筑政治共同体，又需要东亚各国人民对自身的义务和责任有自觉性的认识。东亚各国人民生活在东亚这一共同地区，大家各自的生活对互相都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各自的行动必须要遵守共同的规则，这就是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没有地区性共同意识这一基础的话，政治共同体的构筑恐怕将是不可能的吧。即便对那些缺少这种共同意识的人「由上往下」强行向其灌输共同意识和规则，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恐怕只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吧。所以说，要构筑政治共同体，共同身分认同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了促进东亚共同体构想，必须将 market、polity、community 这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谋求其发展。换种说法，要想使东亚共同体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地区经济协作不仅仅要给东亚各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还必须要能从其中产生出行动规则和纷争解决机制来，还必须要培养出共同的归属感和身分认同来。

但是，东亚地区共同意识和身分认同的构筑非常之困难。困难不仅仅在于地区的多样性。另外，与亚洲这一地区身分认同弱相比较，民族（国家）身分认同相对很高，这也不完全是问题所在。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东亚共同体中拥有最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日本、中国、韩国之间的对立。自从小泉执政以来，日中、日韩关系一味恶化，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想法，亚洲大部分的媒体、学者也都这么认为。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认为，现在还不是谈东亚共同身分认同问题的时候。

持有市场取向意见的人认为，构筑共同身分认同，不仅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是一种很危险的尝试。特别是，对共同身分认同构筑的尝试会动摇民族身分认同，结果使得基于民族主义的对立激化，所以这种尝试不仅不会帮助实现地区共同意识，反而有可能起到相反的阻碍作用。因此很多人认为，要避开共同身分认同等危险的问题，将协作关系限定在经济领域内，这才比较现实。

在这种看法背后的，是希望凭借经济领域内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使得某种地区共同意识能自然形成这样一种期待。不管国民之间相互憎恶或对立的理由是什么，只要从经济协作中能得到同等利益，憎恶或对立自然就能消除。一种较乐观的看法认为，通过经济领域内协作关系的深化，政治·安全保障、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信赖关系不断深化，就有可能实现更深一步的统一。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功能主义态度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但是,这种看法并不见得妥当。根据2005年在日中韩三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对于「你认为将来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会是哪个国家」这一问题,34%的韩国人认为是美国,45%认为是中国,只有6%回答是日本。而中国人中,37%认为是美国,29%认为是EU,16%认为是ASEAN,认为是日本的只有6%。⁵⁶ 在经济相互依存与协作已经取得了如此大进展的今天,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能不说令人惊讶。由此可以确认的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与认识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经济领域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定会促进地区意识或者地区身份认同。不管通过何种形式,要想加强东亚地区主义观念,单有现实存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这一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承认,以及基于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规范和文化的共有,还需要就如何培养地区意识进行不懈探索。否则,就连经济领域内的地区统一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近年来,身分认同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⁷政治理论中的身分认同问题,将「我们是什么人?」这样一种集团性的关于自我的疑问,改为「我们是何种集团·共同体中的成员?」这样一种关于政治共同体归属的疑问而加以提出。而这种理论性关注的背景,自然是全球化和地区统一同时进行这一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现状。在全球经济下,伴随着商品、以及资本和人口跨越国境发生大规模移动,越来越形成了无边界化这样一种状况,而另一方面,伴随着移民人口扩大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大提高,构成国家的各相同文化集团间的对立正越来越表面化。二十世纪的国民国家系统中,国民的身分认同以对国家的归属为前提,而国家则建立在这种身分认同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国家同时进行着统一与分裂时,超越国家概念的地区机构的出现,动摇了对国家的归属这一基础,给国家身分认同带来了严重问题。

只要东亚共同体构想属于市场取向,就无法解决身分认同的问题。而如果没有市场的话, polity、community 共同体也都将是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市场才是地区统一的基础。但是仅从市场无法产生出治理,也无法培养出身分认同。要构筑这一系列要素,需要明确的政治意向。

接下来,为了构筑东亚共同身分认同,我做了一些考察研究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3 东亚的身分认同形成

(1) 民族身分认同和民族主义

为了考察东亚地区意识或身分认同的形成,首先需要指出集体性身分认同的两种特征。正是由于这两种特征没有得到认识,才会产生对共同身分认同构筑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的前提,就是身分认同的本质主义和单一主义。

集合性身分认同有多种形式,家庭、民族归属、市民权利、民族主义、地区性连带关系、乃至世界大同主义。对某些人来说,血脉、出生地、土地以及共同的记忆等实体成为了结合基础,对另一些人来说,财富、繁荣、或者对共同为协的抗争等目的成为了结合基础。从集体性身分认同采取的如此多的形式就可以看出,本质主义看法是错误的。集体性身分认同不是人类集团的本质,集团就其所在环境来说不过是偶然形成的社会性构筑物。如果采用这种建构主义的看法的话,从原理上来说,集体性身分认同还有可能随着环境发生变化,还有可能重新进行新的构筑。

第二种错误的看法是单一主义。我们是亚洲人,就不可能同时还是欧洲人,如果无论如何也想成为欧洲人的话,就只能放弃自己作为亚洲人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两种归属、两种身分认同中选择其中一种。但是,更多的时候,人类并不仅仅只有一种身份。人类

因其生活层次及机能，同时归属于家庭、地区社会、工作组合、企业和学校等等复数集团，并由其多重性的归属而带有多重身份。很多时候，这些归属是被阶层化、统一化了的，单独一个人极有可能拥有多重、多元归属。在作为亚洲人的同时，还是日本人或是中国人，这一点问题都没有。集体性的身分认同是多元主义的。

在东亚各国，比起亚洲人这一地区身份来，民族身分认同要更加根深蒂固。⁸东亚的民族身分认同，是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以及对抗西欧和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为中心构筑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民族身份对近代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且，依然有很多看法认为，基于不同的文化·语言·价值观基础上的民族身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认为东亚共同身份的形成是不可能的这一主张的根据也在于此。

9

但是，这种看法将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混同起来了。民族身份来自于基于本国文化独特性的对国民统一的要求，而民族主义则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作了明确的划分，将他人集团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否定他人集团的一切这样一种运动。民族主义来自于对身分认同的本质主义、单一主义的认识。然而，采用民族主义这种形式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任何利益，结果反而是影响了其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职责、发挥作用方面的威信。

（2）政治意向的必要性

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论者中的多数人，以 EU 为模型对东亚共同体持有否定性的预期看法。因为和欧洲的条件相差太大，所以很容易得出东亚共同体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结论。特别是，相对于欧洲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东亚却并不存在类似基础，很容易以这一点作为理由得出在东亚无法获得共同身份认同这样的结论。

但是，乍看之下欧洲似乎是拥有基督教这一共同的文化基础，而实际上欧洲却是由多种异质要素构成的地区。欧洲文明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克里特的传统、德意志的封建制度、斯拉夫以及犹太文明等等多种异质要素的复合体，在近代国家形成之后，民族身份也多种多样并且多为敌对性的。另外，从 EU 宪法通过的国民投票在法国和荷兰被否决这一点来看，欧洲的地区身份认同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而且，在统一过程中，与欧洲地区意识形成相对，各国国内对抗这一统一意识的民族主义活动也很强烈。如果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话，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文化同一性基础上的欧洲统一已经实现。在欧洲，共同身分认同是在统一过程中出现的，是统一的产物而不是统一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从欧洲统一经验中借鉴的，是在既存民族身份之上还可以添加新的地区性身份，复合性、多层性的身分认同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结论。

还有一点——这一点才是对东亚地区统一来说最为重要的——成为欧洲地区性身份基础的，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而是对于参与共同地区性事务重要性的自觉认识。21 世纪的世界中，各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地区内相邻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外部最终都是紧密联系着的。单靠一个国家无法实现和平或者繁荣。那么，民族身份就不是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排他性的、一元性的了，它必须与地区性身份形成复合关系。

在欧洲，基于此种自觉认识基础上的统一与地区性身份的构筑得以同时进行，要归功于那时政治领导发挥的作用。在地区长期性展望的原理基础上，各国间反复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和协调，与此同时在各国国内又向国民反复作了宣传教育。欧洲的身份不是对既存身份的再次确认或再次发现，而是通过磋商和宣传教育新构筑的。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想要构筑这样的身分认同，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向是十分必要的。

（3）社会保障系统的构筑

那么，构筑地区性身份又有哪些对策呢？迄今为止，人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扩大对话和讨论的空间、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教育、对下一代人才的培养、跨国市民社会的协作等等。在这里，我想提的建议是构筑地区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亚洲，通过经济共同体的实现，可以期待地区整体经济的大力发展。受经济发展之恩惠，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没有得到这种恩惠，生活水平反而相对下降了。在任何一个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国家中，高速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曾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混乱。特别是在遭遇了高速工业化的农业地区，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要求的教育培训以及人才培养不够充分的国家，以及财富再分配系统出现问题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有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产生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历从19世纪至20世纪的工业化的各发达国家也面临过同样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国民分裂，阻碍了民族身份的形成。这坏处对于地区性身份来说也是一样的。产生了能受到经济发展恩惠的基层和不能受到经济发展恩惠的基层，如果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的话，不管是在这一国之内，还是在地区整体范围内，都会使共同意识更难形成，也会使地区性身份的构筑变得更加困难。

作为促进民族身份构筑的策略之一，各发达国家就确立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点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上述原因不能完全成为发达国家这么做的理由。因为各发达国家都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国民国家的凝聚力。虽然社会保障制度不会直接消除收入差距，但会通过「national•minimum」（国家最低限度生活保障）来降低国民生活风险，通过教育福利服务使得生活机会（life chance）平等化。这不仅使得国民生活水平平均化，还使得国民生活样式也均一化了，结果就产生了共同的国民文化，实现了民族身份认同。¹⁰

但是，在全球化经济大力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作为一国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其明显的极限。也就是说，在跨国经济活动不断扩大、发展的环境中，一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可以通过作为其经济伙伴的相邻各国的贫困化得到解决。而其结果则是，扩大了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促进地区性身份的统一，反而促进了它的分裂。

在上述前提下，为了推进地区统一的向前发展，需要在推进经济统一的同时，建立跨国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说，需要建立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再分配政策，以及建立「地区最低限度生活保障（regional•minimum）」标准来替代国家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然后，再着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制度设计、所用数据的系统整备、关于具体事务的技术·人材开发等管理方面的课题。东亚地区整体的这种社会保障体系的构筑，完全可以成为地区性身份的基础。

11

总结

虽然说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早已正式开始，但现在在东亚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经济差距、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安全保障问题等等。不过，在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中，之前认为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大变化的看法已经不同了，今后应该会不断有新的建议被提出。即便是从这一点考虑，东亚共同体构想也是有意义的。

为了促进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日本、中国、韩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如同前面讲的那样，必须要将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区别对待。但是，如果放任日本、中国、韩国间敌对的国民感情不管不问的话，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只怕会对东亚共同体构想带来不小挫折。

中国在导入了市场经济之后，经济取得蓬勃发展，为了维持统治体制的凝聚力，国家就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作了不小的努力。然而，在手机以及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信息化社会，爱国主义以及民族身份情感的活动范围超过了预期设想，有可能会演变为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

在韩国，由于国民对过去受日本殖民统治，以及对现在国家分裂状况存在共鸣，故其谋求共同文化传统·身份认同的运动较为激烈，而这亦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化。

最后再来看日本，战后60年间日本一直奉行的和平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得到邻国的认同和理解，却不断被指责过去殖民统治时犯下的罪行，对这种指责的不满正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中传播开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新型扭曲民族主义的基础。

可以认为，现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各国的政治领导，并没有积极地通过政治演说和其他措施来对这种民族主义的高涨进行遏制。特别是日本的小泉政权，一方面想要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向前发展，一方面又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行动招致日中、日韩之间对立感情高涨，并且小泉政权对这一事实太过迟钝、麻木。恐怕小泉首相只看到了日中贸易投资不断扩大这一方面，而无视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严重性吧，所以他才会一再发言说「日中关系现在非常稳定」。然而，单靠经济领域内相互依存关系的扩大不能调和国家间的对立感情，单靠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无法形成相互信赖关系和共同身份认同。就问题解决表示坚定的政治意向，才是经济领域外的相互协作关系的基础。

¹ 菊池努「「地域」を模索するアジア：東アジア共同体論の背景と展望」『国際問題』538号（2005年1月）

² 2003年ASEAN協和宣言IIで構想が発表されたASEAN共同体も、この三つの機能を含むものとされている。

³ 青木保「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文化的基盤」『国際問題』538号（2005年1月）。

⁴ 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NTT出版、1997年。

⁶ 朝日新聞2005年4月27日。

⁷ たとえばY.H.Ferguson and R.W.Manbach, *Global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Changing Bases of "Us" and "Th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Issue 2, Summer 1999.を参照。

⁸ 猪口孝他編『アジア・バロメーター：アジア都市部の価値観とライフ・スタイル2003年世論調査の分析と資料』明石書店、2005年。

⁹ こうした考え方を明瞭に示しているのが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の衝突と21世紀の日本』集英社新書、2000年、である。ここでは、愛で電ティティの問題がきわめて単純な決定論というかたちで提出されている。

¹⁰ T.H.マーシャル,T.ボットモア『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と社会階級：近現代を総括するマニフェスト』法律文化社、1993年。

¹¹ 広井良典「アジア、社会保障で協力を」『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9月29日。